

学术支持:
清华大学新经济与新产业研究中心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改革和发展研究院
总顾问:成思危(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高级顾问:张文台(全国人大环资委第十一届副主任)
主任)
编委:管益忻 陈宇 黄文夫 赵红 白卫星
编委会主任:管益忻
副主任:陈宇
主编:管益忻
副主编:启文 白卫星

学术顾问:(按姓氏拼音排序)

巴曙松	蔡继明	陈东琪	陈栋生	陈佳贵
程恩富	迟福林	戴园晨	范恒山	樊 纲
高尚全	顾海兵	谷书堂	贺茂之	洪银兴
黄范章	贾 康	江春泽	金 碚	李成勋
李江帆	李京文	李维安	刘诗白	刘 伟
茅于軾	任玉岭	宋洪远	宋守信	宋养琰
谭崇台	王东京	卫兴华	魏 杰	吴 澄
徐长友	晏智杰	杨家庆	杨启先	张曙光
张晓山	张卓元	赵人伟	郑新立	朱铁臻
周叔莲	周天勇	邹东涛		

发展经济新内涵:准确判断外部环境十分关键

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环境变了,最大的变化就是全球经济低迷,可能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低迷会长期化,这是大家不愿意承认,但是又不得不承认的现实。对于我们出口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和以前不同了。

■ 隆国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部部长、研究员

过去 30 年我们抓住了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世界银行也说中国是全球化进程当中获利最多的少数几个发展中国家之一,这个判断是基本准确的。经过 30 年发展后,金融危机爆发了,美国人又战略东移了,出现很多新的变化。“十八大”再次强调我们仍然处于重要的发展战略机遇期,但是条件和内涵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来一个重要的环境就是全球的经济繁荣,一直到 2007 年以前,这为中国出口导向的经济活动提供了市场机遇。同时,还有另外一个机

遇,就是东亚地区出口导向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跨境转移,这个重大战略机遇我们抓住了,我们采取的措施是加工贸易政策,利用外资政策,比如特区等采取了很多措施。我们是比较成功的,抓住了产业转移的机遇,给外部提供了市场。

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环境变了,最大的变化就是全球经济低迷,可能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低迷会长期化,这是大家不愿意承认,但是又不得不承认的现实。对于我们出口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和以前不同了。当然经济增长的格局有一个变化,就是新经济体相对来说保持了比较放松的增长,这对我们来说意义是不一样的。我们出口到美国、日本、欧盟的产品是各种各样的消费品,从纺织、服装、玩具,一直到消费电子如电脑。但我们出口到发展中国家的东西不同,一类是更便宜的,还有一类产品是在发达国家卖不掉的东西,就是资本技术密集的产品。

从引进来的角度来看,过去我们引进了东亚地区出口导向型的劳动密集型的外企。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我们对跨国公司做了较大规模的调研,大概有 470 多个调研。我们发现,第一是跨国公司对中国投资环境的变化评价发生了变化,以前是把中国的低成本劳动力作为最吸

引它的因素,其战略也是把中国作为一个面向全球低成本出口基地。我们调查结束以后,联合国也公布了在境外跨国公司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第一次取代美国,变成跨国公司搞研发的首选。有两个因素,一是中国的国内市场,二是中国的人力资源。虽然我们普通劳动力成本上涨了,研发人员一年有 700 万毕业生,其中有 270 万是理工科,1/10 达到跨国公司要求。美国大概是 6 万多人,欧洲多一点。也就是说,他们加在一起还没有中国理工科人数多,这是高端产业向中国转移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再一个是走出去,金融危机爆发对出口毫无疑问极为不利,但对我们对外投资并购,低成本获取境外研发资源、技术、品牌、国际销售渠道,也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以前想买,人家不卖给你,或者要花很高的代价。现在是不能不卖给你,企业的资金链紧张了。其次是它可以以比较低的价格获取,所以就出现了不少的成功并购案例。

总体来看,过去的机遇有利于我们市场扩张,是一种繁荣的表现。现在新的机遇可把它称之为结构升级的机遇,不管是引进来,还是走出去,对于我们加速升级都提供了一些历史性的机遇。



对当前外贸形势的几点思考



我们觉得现在应该对发展外贸认识得更清楚一些,支撑外贸发展的不是外贸本身的问题,是制造业的问题,制造业竞争力和劳动生产力决定了外贸。

■ 霍建国 商务部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从历史上看,外向型经济还是以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为主要内容,当然后期外向型经济的概念逐步在扩大,包括产业升级的治理,包括走出去。单纯从贸易的角度讲现在有一个趋势,即强调内需为主。外贸在发展过程当中消耗了大量资源,效益又不高,批评外贸的声音还是不少,但我们还是要坚定外贸发展的信心。

去年谈外需的时候,我们也在强调稳定份额,但是要考虑到目前已经产生的变化。在 2005 年之后,随着人民币的升值,外贸的结构和质量、效益已经在发生变化。市场决定一切,我们要关注这些变化。2011 年广东和江苏的差距,以及江苏和山东的差距,可以归结为广东转型升级起步早,江苏有特殊情况,即光伏产业受到重创,还有船舶不景气的问题。现在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结构在迅速地产生变化,加工贸易在急速下降。出口比例已经到了 32% 以上,加工贸易控制在 1/3 还是比较合理的结构,问题是如何实现转型升级。

我们觉得现在应该对发展外贸认识得更清楚一些,支撑外贸发展的不是外贸本身的问题,是制造业的问题,制造业竞争力和劳动生产力决定了外贸。如果外贸竞争环境条件的变化,也是由于这两年中国制造业不景气造成的,制造业大幅度回落,从增长 16%、17% 的高点,回落到 14%—15%,现在维持在 10%;制造业投资回报率仍然是很低的,3% 到 6%,理财是 4.5%,企业没有必要冒这个风险投资搞实业。所以要想解决问题应该改变制造业的发展环境。“十八大”已经说得很清楚,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我们的制造业 2011 年超过美国,刚刚超过,我们自己就觉得不灵了,现在很多人都在说我们的制造业困难重重,很难继续往前发展。1825 年英国成为全球最高的制造业大国,它的最高市场份额到了 40%。美国在 1889 年超过了英国,但它最高的份额是 43%。日本也是在 83 年之后制造业竞争力数字显示在全球制造业前多少项创新里占了一半。中国现在的制造业只不过从规模和整个布局、产能产量上刚

刚进入到第一。刚刚确立了规模优势,往后是制造水平的问题,所以这是一条线,我们应该对它有信心。

如何实现创新发展,怎么构建新的竞争优势,这是需要我们研究的。大家都在说转型升级构建新的竞争优势,我本人理解转型升级不意味着我们放弃现有的都去搞光伏产业,都搞中高端。对于企业来讲认真做好你的产品,让它能够有附加值,投入产出能够有效益,本身就是在转型升级。国家的转型升级有一个总的考虑,是中高端制造业的发展问题。企业不管干哪行,做好你这个产品卖出去了,如何再做出品牌来,像“苹果”似的能够获得超额利润,你就做得很好。所以,对于构建新的竞争优势确实应该好好去研究。现在讲得比较多的就是进出口平衡,但是我觉得还没有讲到位。进出口平衡是从量上讲,扩大进口,一方面满足国内的技术更新需要,另一方面保持平衡,但实际上真正的外贸价值在于通过进口作用于国内产业竞争力的提升,使得这个产业再能够出口,然后再进口,再装备。这种良性循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需要产业政策 and 贸易政策有一个非常默契的配合。

从走出去看,现在苗头确实不错。2012 年 11 月份是 620 多亿,增长 25%,全年将超过 700 亿。包括外资,我们都应该放开一点思路。外资现在一是盯着服务业,一是盯着关键领域的市场需求。我们现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不能关起门来自己搞,还是要有合作合资问题。目前制约发展的首先还是制造业,制造业整个的发展环境是有问题的,信贷也好,资源也好,投融资政策也好。所以,我一直主张投融资体制要继续放开,要允许各种不同的经营主体有选择地投入。

关于贸易摩擦问题,欧美冲着我们竞争力强的产品下手,哪个企业发展起来打哪个,但是我们真正的被动还不在这里,而是人家经常在公共场合拿出你的文件,对出口企业要支持多少钱,或者给创新型企业要贴多少钱。这些东西非常被动,我们现在也没招。这些东西我们到底如何看,公平竞争要不要,还是要维持一部分重点企业优先发展,还有银行信贷公开透明,都值得我们研究。制造业和流通业之间有障碍,地区和省市之间都有限制。中国要出现真正国际上的跨国公司,能不能把国内的问题先解决,允许企业跨省市收购兼并,允许制造业深入到流通业,流通业可以深入到商业,先把这些障碍打通,这也是属于市场要素资源配置问题、市场秩序问题,有时候构建可持续发展需要改革。短期看,构建一些新的竞争力也是比较明确的,关键还是在重视。现在确实不能放弃掉外贸投资,对地方省市来讲,他们就很清楚抓项目,抓外资,指标就上去了。再就是抓出口,但国家层面出口出多了反而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出口过去对于国民福利贡献不大,现在发现了这个问题,就要加以解决。要构建竞争力,通过贸易的福利来使得国民收益更大一点。



■ 张燕生 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研究员

当前的环境仍然是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它是由两大引擎推动的,一是开放驱动。所谓的战略机遇期在世界史上都是开放和市场化时期,或者叫经济全球化时期;二是创新驱动。从全球来讲,重要战略机遇期都有着世界性的一些重大科技革命。因此,在这样的环境中,它是有益于对外开放的,我们要把握全球带来的机遇。

金融危机发生以后,确实也对我们形成了一个战略挑战期,这两大引擎是不是还像过去那样发挥作用?我们研究发现,这两大引擎都发生了很多新的变化。比如,开放和市场化。开放驱动从全球化角度看现在确实有 TPP,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及美国通过 TPP,通过各种方式正在为全球的贸易和投资制定新规则,即我们发现开放驱动这台发动机从 2009 年以后正在发生新变化,在这里我们也看到欧盟的再工业化、再创新。在这方面我们会发现更多地还是促进了一些国家之间在创新驱动转型中间的一些挑战,也包括欧盟解决它的空心化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如撤资。现在距离第三次工业革命恐怕还有相当长的距离。也就是说,在 2009 年全球危机以后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对我们来讲既是战略机遇期,又是战略挑战期。从现阶段来看,就是要把握战略机遇,尽管所面临的困难和风险可能比过去 30 年大很多。在这种形势下我们确实要在对外开放有一些新的考虑。

第二个问题,现在从国内的发展来讲,现在是在新一轮改革开放的起点上。前 30 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是前 30 年的模式现在可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和调整。前 30 年对外开放发挥的作用,也就是出口和招商引资所发挥的作用,会不会在未来 30 年发生一些重大战略上、体制上和结构上的变化呢?我相信一定会,原因非常简单。前 30 年成功发挥了出口带动经济、经济增长和体制改革方面的作用,从目前看它是一个小国模式,很难支撑我们未来 30 年的发展。因此,从新一轮的改革开放角度来看,前 30 年依靠扩大出口和招商引资双轮驱动的外向型的模式恐怕要画句号了,要探索一个新的模式。在新的国际环境下,在新一轮中

当前的环境仍然是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它是由两大引擎推动的,一是开放驱动。所谓的战略机遇期在世界史上都是开放和市场化时期,或者叫经济全球化时期;二是创新驱动。从全球来讲,重要战略机遇期都有着世界性的一些重大科技革命。

国发展的形势下可能要探索和支撑未来 30 年发展的对外开放的新体制机制,新的战略和新的结构。也就是说,未来 30 年对全面提高开放经济水平的这一套探索,应当支撑未来 30 年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发展需要。

第三个问题,新一轮改革开放具有一些新的特点。新一轮改革开放或者是下一步要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能不能像当年应对 WTO 那样在新一轮改革开放中间加入动力,使我们的体制机制能够发生深刻的变化?WTO 我们说得最多的是“狼”来了,当时做决策是把加入 WTO 应对“狼”冲击所采取的变化作为参与全球化融入世界的战略部署。现在我们也面临着一个挑战,即新一轮的“狼”来了,其中最显著的就是 TPP 的挑战。我们能不能在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方面由 WTO 国际通行接轨转向新一轮改革开放,是否能够与高标准的市场经济政策接轨?我们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的体制机制,新一轮改革开放中新的动力能不能做到?以高标准市场经济规则对接,它的要求就是下一步在开放型经济建设中加强法制建设,尽力与这种高标准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相匹配。另外一方面是要走向规范。前 30 年改革开放讲得最多的是转型,未来 30 年新一轮改革开放我们说得最多的应该是走向规范。下一轮改革开放从模式来看,前 30 年改革对外开放中的“两条腿”走路模式即两种外向型经济的模式应该如何转型。

代工模式能不能从前 30 年国际分工的末端走向前端,能否从低端的制造代工走向中高端的研发,这是个大问题。这个代工模式能够把 700 万大学生带上研发代工的主战场。因为从研发的角度来讲,全球的研发资源高度地集中在美日欧。越国际化的研发技术越有难度,怎么打破这个框架?就是要把我们研发中心、培训中心设在美日欧,然后把最新的技术、最新的人才、最新的信息引入国内,让 700 多名大学生上主战场,转化为支撑我们未来 30 年转型创新战略的动力,提供应用型 and 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型的研发成果。

另外,自主制造能不能从前 30 年的低端走向品牌的制造。在开放型经济当中,“两条腿”走路面临着两个问题,一是参与国际分工的部分下一步怎么转,二是参与国际差异化分工和比较优势分工这部分下一步怎么转化。从 30 年引进来的角度看,2005 年以来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就是 FDI 从成本驱动转向市场驱动。也就是说,外商来中国过去靠的是农民工,现在靠的是市场。同时,

也出现外商愿意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并且扩大在中国销售份额等现象。外商这种结构性变化,使得外向型模式下一步转向能够实现公平、非歧视性的开放型经济的体制机制就变得非常重要。2008 年我们完成了两税合一,但仍然存在各种各样的不公平和歧视性政策。下一步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也就是怎么能够适应引进来所带来的结构和战略性新变化,以此来调整下一步体制机制。

在走出去方面我们需要回答一个问题。我们经常用外贸依存度来衡量开放度,美国和日本的外贸依存度都是 30% 左右,而中国去年外贸依存度是 50%,德国也是 50%。美国和日本是一个开放度很高的国家,为什么它的外贸依存度低呢?道理很简单,就是美国和日本已经完成了全球投资、全球生产、全球销售和全球服务的生产体系建设。2012 年我国上半年对外金融资产已将近万亿美元,但是对外直接投资只占 8%,因此下一步也就是如何把我们前 30 年积累的将近万亿美元的资金管好,能够把未来 30 年中国通过各种方式变成全球制造,利用全球的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来发展我们未来 30 年的开放型经济,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走出去”这部分怎么探索出新的模式?现在开发银行在探索新的模式,用其对外投资不多的前期费用完成 120 多个国家的规划,通过规划对 120 个国家重点领域和经济社会发展进行了全面的调查研究,然后把一些好的项目带到国内来招商引资。国内的企业参与到这些项目的投资以后,行内把它的金融服务跟上,这是不是能够成为未来发展一个新的模式。

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全球针对中国贸易的地方保护主义从战术层面上上升到了战略层面,已经从传统的贸易摩擦转向国内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在这种情况下还是要改革开放,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和开放型经济建设,从这个角度来看,下一步如何能在体制机制上探索支撑未来 30 年的新模式,对我们下一步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的贸易趋于平衡,国际收支趋于平衡。但从目前来看,刀锋上平衡的风险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未来如何能使我们的国际收支状况和贸易收支状况在一个可持续发展水平上防范和抵御未来国际收支有可能出现的危机?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在下一步研究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时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我们确实存在几个结构性难题,加工贸易的顺差和一般贸易的逆差两个并存的局面会进一步扩大。我们对外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规模越来越大,这种情况使得我们对外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在境外可出现一些长期结构性风险。当我们资本项目可兑换和资本项目开放走到一定程度时,会不会再出现像 2011 年 8、9 月份那样,全球唱衰中国,会出现比 2011 年大得多的资本外流?到那个时候我相信各种矛盾的累加有可能产生我们预见不到的困难,开放型经济的风险无论是国际的还是国内的都非常重要。